

(清)章学诚著 ● 仓修良编

文史通义新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9 号

文 史 通 义 新 编

[清] 章学诚 著

仓 修 良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30 插页 6 字数 642,000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25-1247-9

K·122 定价 19.10 元



章学诚画像
(选自《清代学者像传》)

前言

《文史通义》是我国著名史学家章学诚（一七三八—一八〇一）的代表作。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自问世以来一直未曾有过令人满意而完整的定本。为了弥补这个缺憾，笔者根据章氏著作此书的本意，在通行版本的基础上，对这部史学名著进行了重新整理和编定。以下就整理中的有关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撰述《文史通义》的设想，早在章学诚三十岁以前已经形成，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他在《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中曾表示：“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而闻见寥寥，邈然无成书之期，况又牵以时文，迫以生徒课业，未识竟得偿志否也？”（《章氏遗书》卷二十二）由于生活的极不安定，所以迟迟未能动笔。乾隆三十七年，也就是他三十五岁那年，他在《侯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中表示要着手完成这一计划：“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书虽未成，大旨已见辛楣先生侯牍所录内

篇三首,并以附呈。先生试察其言,必将有以得其所自。”(《章氏遗书》卷二十二)同样的意思在《上慕堂光禄书》和《上晓徵学士书》中也都有所表露,但直到他逝世尚未完成原定的写作计划。如《浙东学术》一篇,即成于逝世的前一年,而在文中提到的《圆通》、《春秋》等篇,却始终未能成篇。作者在世时曾有过此书的选刊本,但流传并不广,正如他在《与汪龙庄书》中所说的那样,“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姑择其近情而可听者,稍刊一二,以为就正同志之质,亦尚不欲遍示于人也”。章学诚在去世之前五年,即他五十九岁那年所写的《跋丙辰中山草》一文中曾表示要对《文史通义》进行最后编定:“所草多属论文,是其长技,故下笔不能自休。而闲居思往,悼其平日以文墨游,而为不知己者多所牴牾,而谬托于同道也,故其论锋所指,有时而激,激则恐失是非之平。他日录归《文史通义》,当去芒角,而存其英华,庶俾后之览者,犹见其初心尔。”(《章氏遗书》卷二十八)然而实际上亦未能完成,因此,他在临终前数月,不得不将所著文稿委托友人萧山王宗炎代为校定。王宗炎收到文稿后,为了早日给章学诚回信,便在匆忙中提了一个编排意见(见本书附录)。王宗炎在信中表示,他所提尚属初步意见,欲待“遍览一二过,方能定其去取”。事实上,后来因人事变迁,岁月蹉跎,最初的意见竟成为最后的定论,这就是他所编定的《文史通义》内容所以与章学诚著书宗旨不甚相符的症结之所在。

对于王宗炎的编排分类,章学诚本人意见如何已不得而知,但章氏次子华绂对此显然并不同意,所以他于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在开封另行编印了“大梁本”《文史通义》。他在序文中说:“道光丙戌(一八二六),长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并穀陞先生

(即王宗炎)订定目录一卷,查阅所遗尚多,亦有与先人原编篇次互异者,自应更正,以复旧观。”华绂编定的“大梁本”是《文史通义》正式刊行的第一个本子,嗣后谭廷献、伍崇曜及章氏曾孙季真光绪四年(一八七八)所刻的《文史通义》都出于这个“大梁本”。光绪间,桐城萧穆在《记章氏遗书》一文中记述了章氏著作的散聚经过,并对旧钞本和“大梁本”《文史通义》作了比较,认为:“华绂所云王公订定目录一卷,查阅所遗尚多,尚有实据。”但萧穆对“大梁本”却未作任何评议。光绪年间,在江标所刻的《灵鹫阁丛书》中收有《文史通义补编》一卷,然所补并不完备。一九二〇年,浙江图书馆得会稽徐氏钞本《章氏遗书》,铅印行世,亦尚未能包括章氏全部著作。一九二二年,吴兴嘉业堂主人刘承幹依据王氏所定之目录,搜罗增补,刊行了《章氏遗书》五十卷。内容大体分三个部份:第一部份是《文史通义》内篇六卷、外篇三卷,《校讎通义》内篇三卷、外篇一卷,《方志略例》二卷,《文集》八卷,《湖北通志检存稿》四卷,外集二卷,《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卷,凡三十卷,目录大体照王氏编次;第二部份为外编十八卷,即《信摭》、《乙卯札记》、《丙辰札记》、《知非日札》、《阅书随札》各一卷,《永清县志》十卷,《和州志》三卷,最后是补遗及附录各一卷。后来又增补了《历代纪年经纬考》、《历代纪元韵览》两种各一卷。从此,章氏著作遂得比较完整地刊行于世。于是《文史通义》也就有了另一种版本——《章氏遗书》本(以下简称《遗书》本)。一九八五年,文物出版社据吴兴嘉业堂刘承幹刻本并从抄本中选录若干篇断句影印,书名为《章学诚遗书》,是至今搜集章氏著作最全的一个本子。《遗书》本《文史通义》与“大梁本”的不同之处是:内篇的排列次序及分卷,“大梁本”为五卷,《遗书》本为六卷;在所

收篇目上《遗书》本多出《礼教》、《书朱陆篇后》、《所见》、《士习》、《书坊刻诗话后》、《同居》、《感赋》、《杂说》八篇，而少《妇学篇书后》。两本的外篇虽都分为三卷，内容则完全不同，“大梁本”所收是论述方志之文，《遗书》本则为“驳议序跋书说”，两者孰是孰非，至今尚乏定论。

解放以后，所出版的《文史通义》整理本主要有二个，一个是一九五六年由设在北京的古籍出版社印行的，一个是一九八五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通义校注》，前者基本依据《遗书》本，后者则依“大梁本”。这二个本子的编印整理者虽然都力图体现《文史通义》的原貌，可惜由于对此书的情况了解不够，所以都不能令人满意。

综上所述，目前所流行的《文史通义》版本，主要就是“大梁本”和《遗书》本两种，前者是章学诚之子华绂所定，后者基本据王宗炎的意见编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所定都不代表章学诚本人的想法，现在要尽可能恢复《文史通义》的原貌，自然应以章学诚本人的意愿为准。

二

重新编定《文史通义》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便是如何看待王宗炎对原稿的分类和编次。如前所述，王宗炎的区分编排仅是初步意见。所以不久华绂就提出“查阅所遗尚多，亦有与先人原编篇次互异者，自应更正，以复旧观”的批评意见。在王宗炎的编目中，将有关方志的论文，全部排除在《文史通义》之外，而另编《方志略例》两卷，这一做法，我们认为是不符合章学诚本意的。章学

诚在《又与永清论文》中把自己所撰的《亳州志》“义例之精”，视为“《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并认为史家若能“得其一二精义，亦当尊为不挑之宗”。可见他对方志论文在《文史通义》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视的。不仅如此，章学诚在自己的文章中还明确指出了放入外篇中的方志论文篇目，他在《释通》篇云：“又地理之学，自有专门，州郡志书，当隶外史。”自注曰：“详《外篇·亳州志议》。”（《文史通义内篇》四）显然，王宗炎将方志论文从《文史通义》中排除出去是不妥当的。我们再从这些方志论文本身来看，名为讨论方志，而大量篇幅都是论述历史编纂学上许多重要问题，不仅对史体演变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而且对史家、史著、史学思想、史家流派也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评论，有许多评论确实做到了“发前人所未发”，内容如此丰富、如此集中的史学评论专著以前还不多见。因为章学诚认为，方志本属史体，两者不分畛域。那么把它放在《文史通义》当中，显然是名正言顺的。

至于王宗炎所编之外篇——序跋书评驳议之类，当然也属《文史通义》内容，如章学诚在《与邵二云论文书》中曾明确说过：“《郎通议墓志书后》，则《通义》之外篇也。族籍名字，书法之难，本文论之详矣。”可见此类文字，作者自己也是定为外篇的。但正如华绂所说，王氏对这类文字“所遗尚多”。如章学诚在《上朱大司马书》中说及，他从“编书体例”角度所写的《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选商语》一文“亦《通义》之支翼”（《章氏遗书》补遗）。而在王宗炎所编之外篇中即不收此文。再如在《论文上弇山尚书》一文中章学诚曾指出，“欧、苏族谱，殊非完善”，“康氏武功之志，体实芜杂”，他在《文史通义》中“均有专篇讨论”。前者实指《家谱杂议》（载《章氏遗书》卷二十三）一文，后者则为“大梁本”外篇中的《书

武功志后》，王氏所编《文史通义》外篇均未收入。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为了使《文史通义》按照作者撰述本意所具之面目出现，不仅上述两种版本的外篇皆需收入，而且《章氏遗书》中现存有关论述文史的篇章亦应加以选录，因为王宗炎的编目收录并不全面，许多很明显属于《文史通义》内容的也未加收录。不过，从现有材料来看，《文史通义》中有不少重要内容无疑是已经散失了，如作者自己在有些文章中曾提到过的《诸子》、《家史》等篇竟不可复得。

最后还应该附带说明的是，从前曾有人认为《校雠通义》也是统于《文史通义》之中的，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这是章学诚的另一部学术著作，对此笔者在《章学诚和〈文史通义〉》一书中已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这里就不再谈了。

三

《文史通义》没有一个严密的著述义例，加之作者撰著意图又多，因而就使得它内容庞杂，包罗万象，组织松弛。从形式上看，全是由单篇论文汇编而成，很难说是一部严整的论著。又由于作者一生中生活极不安定，其著作大多写于“车尘马足之间”，其中许多篇又是“藉人事应酬以为发挥之地也”。因而各篇之间就缺乏紧密的联系。这次新编，自然不能脱离它的这一特殊情况而另订体例，因此只能紧紧围绕作者意图而使之尽可能恢复原貌。实际上我们今天整理新编，既不可能、也不应当改变其内容庞杂、组织松弛的状况，否则就不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了。因此，新编的原则，不是将原来流行的两种版本打乱重新编次，而

是在两种流行的版本基础上加以增补。具体而言,内篇则以《章氏遗书》本为主,增以“大梁本”多出之篇。外篇则将原来两种外篇内容合并收入,编为六卷,前三卷为“驳议序跋书说”,后三卷为方志论文。为了照顾长期来已形成之习惯,每卷排列顺序亦基本依旧,仅稍作调整,而增补的各篇,则按其内容性质分别编入各有关卷中。

这次增补的原则,首先是章学诚生前在文中已经确定和当时传钞本已标明者。如上文已指出的《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选商语》和《家谱杂议》等就是如此,后者在会稽徐氏钞本《章氏遗书》中还注有“庚戌钞存《通义》下”字样。又如《方志辨体》,会稽徐氏钞本《章氏遗书》中亦注有“文史通义”字样。其次是根据章学诚著作此书之宗旨衡量各篇内容而定,内容符合,并且对研究文史校雠及其学术思想有作用者则加以选录补入。如关于论文方面所增选的篇章,许多论点,都很有价值。就以《文学叙例》而言,文中提出:“文之与学,非二事也”,“学立而文以生”,“文者因学而不得已焉者也”。能将历代文体的演变与当时科举考试、政治要求联系论述,最后还指出历代文风之不同,“汉人之淳质,六朝之藻绘,唐人之雅丽,宋人之清疏,体咸备也。”又如《文格举隅序》中说:“古人文无定格,意之所至而文以至焉,盖以所以为文者也。文而有格,学者不知所以为文而竞趋于格,于是以格为当然之具,而真文丧矣。”这些论述,确实都很有见地,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价值,这类文章,增选入《文史通义》之中,应当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这些文章中,都包含着作者对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见解,也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他著述《文史通义》的宗旨。

这次增补之中,有很大一部分篇目是反映章学诚史学理论方面的文章,《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则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这是章学诚晚年论述史学和方志的重要作品,许多论点,确实做到了发前人所未发。又如《论课蒙学文法》一文,主题虽是论述儿童启蒙教育,但全篇都贯串着对各种文体的评述和对《左传》、《史记》二书的分析评论,其分析细致精微,在其全部著作中也可列为上品。再如《与阮学使论求遗书》一文,不仅列举东南藏书之富甲他处,而且论述了谢承《后汉书》比范曄《后汉书》有四大长处,文中从藏书而论及校雠家法、文章源流。以前学者对谢、范二书作比较研究并不多见,章氏此举自然就值得重视了。以上所举三篇,其内容都是比较集中地评论史体、史家和学术著作,探索学术的源流与发展,这不仅与《文史通义》著述宗旨相一致,而且就其所述内容之重要也是人所共知。遗憾的是当年王宗炎整理文稿,竟莫名其妙地将第一篇编入《校雠通义》外篇,另外两篇则编入一般文集,显然都是不妥当的,况且《校雠通义》并无外篇,这次增入《文史通义》自然是名正言顺了。

这次增补的再一方面内容,则是反映章学诚的历史哲学观点的文章,可以《刘氏书楼题存我额记》和《四书释理序》等文为代表。特别是前文作者提出了富有哲理性的论点。他从世界万事万物都在变的观点出发,论述“我”也是在不断变化,而且时时刻刻在变,“日迁月化而不自知也”。特别是那些对自己有所要求而不放荡,并欲有所作为的人,更是如此。特别可贵的是,他提出“欲存我者,必时时去其故我,而后所存乃真我也”。这类文章,不仅对研究章学诚学术观点非常重要,而且对今天建设精神文明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谈治学方法、评论社会学风的文章也属这次增补的范围，因为这是章学诚学术思想重要组成部分，无论研究章氏史学、文学还是哲学思想，都要研究这个内容。而这些内容又往往多保存在与师友及门人子侄的书信之中，像《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就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文中既叙述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又表达了自己的学术主张，他要作《文史通义》的想法，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最早提出。文章虽成于早年，但许多论点却一直成为他终身的座右铭。如《又答朱少白书》中说：“大抵身履其境，心知其意，方有真见解。不用功于实际，则见解虽高，而难恃也。”这都是做学问上多年积累的经验之谈。而在《与史氏诸表侄论对策书》中，不仅记载了章学诚的治学经验，而且还明确宣称他“不欺”、“不能作违心之论”的原则立场。需要指出的是，此文在《章学诚遗书》出版前尚未正式刊行过。诸如此类，无疑对研究章氏学术思想，了解他的艰难的学术生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方志论文是《文史通义》的组成内容，这是章学诚生前所定，故其次子华绂所刊之“大梁本”，外篇全是方志论文。方志分立三书，乃是他方志学的核心，标志着他的方志理论的成熟、修志体例的完备和方志学的建立。大型志书《湖北通志》，是他亲自主持编纂、全面体现方志分立三书精神的著作，也是他方志理论成熟阶段的代表作，故其各种序论都具有定论性质。这次增补，选录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几篇，如《为毕制府撰湖北通志序》（有的选刊本题为《为毕制府拟进湖北三书序》），是一篇具有纲领性的方志论文；又如该志《凡例》，对各种分志的撰写都提出了严格要求，许多议论对今天编修新志仍具有借鉴作用。

这次增补中还有一部分属应酬文字,如志状墓铭,家族谱序。应该指出的是,章学诚所作这类文章,并非出于空洞的恭维应酬,而是有实在的内容,因为他经常利用这些应酬文字来发挥自己的学术主张。他在《答陈鉴亭》信中,还阐述了他对写作此类文字的看法:“足下自谓应酬人事中学为古文,恐无长进。此与史余村前此来书,自言欲学古文,苦无题目,同一意也。仆意则谓文以明道,君子患失于道有所未见,苟果有见于意之所谓诚然,则触处可以发挥,应酬人事,亦以吾道施之。”

这次新编中还选录了四篇比较特殊的文章,即《上慕堂光禄书》、《上晓徵学士书》、《与胡维君论校胡穉威集二简》和《侯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四封信中都讲了自己著述《文史通义》的情况,明显不应是《文史通义》之篇目。但考虑到能够使读者了解章学诚著述此书某些情况与甘苦,对研究该书的学术价值与作者的学术思想无疑还是有帮助的。况且文章又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章学诚的重要学术思想和观点。尤其要指出的是前两篇还是佚文,在至今所有刊行的章氏著作的各类版本中均未收录,看来胡适、姚名达二位编《章实斋先生年谱》时也未见过,故将之收录尤为重要。

这里还想说明一点,《文史通义》的内容十分庞杂,这是由于作者研究范围太广所致。他于“古今著术渊源,文章流别”都殚心研讨,“自六艺以降迄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上晓徵学士书》),显然这就不限于文史了。也许当年他已意识到研讨内容之庞杂,所以就在给钱大昕的这封信中讲了自己要撰著的《文史通义》,拟“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这封信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文史通义》究竟是分几篇?目前流行

的版本均为内外两篇，而信中分明是说“分内外杂篇”。如果按作者原意来分编此书，自然在某些方面就得打乱原流行的两种版本次序了，为了保持新编本与习见的通行本之间的连贯，也便于读者的使用，这次就不再另行分设“杂篇”，而将这一问题留给有关专家再作研究了。

总的来说，这次新编以章学诚著述该书的宗旨为原则，希望以尽可能接近作者著述此书原意的面貌贡献给读者，因此它不仅包括了原来通行的两种版本内容，而且选录了《章氏遗书》中有关篇目和部分佚文的重要篇目。故全书共收三百零三篇，其中原两种版本内所收之文合计二百一十八篇（包括古籍出版社的补遗十三篇），新增补之文为八十五篇，增加篇幅近三分之一。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该书的流传情况，除了将章华绂在刊刻大梁本时所作的序收入外，还将伍崇曜、季真、王秉恩三人为该书所写的跋和王宗炎《复章实斋书》作为附录收入。

本书在编选和校勘过程中，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室诸先生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因此本书能够献给读者，首先应对他们表示非常感谢！叶建华同志代我誊抄了目录、前言和部分篇目，在此一并表示致谢。限于个人水平，编选和校勘方面容有不当之处，实所难免，期待方家读者指正。

仓修良

一九八三年七月初稿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修改定稿

一九九二年三月复审于杭州大学历史系

凡 例

一、新编本《文史通义》共收章氏有关文章 303 篇。其中，为已刊行各种版本所收入的文章计 218 篇，此次增补收入的文章为 85 篇。

二、新编本增补文章的原则有三：其一是章学诚生前曾明确提及属于《文史通义》者。其二是当时传抄本已标明属于《文史通义》者。其三是根据章学诚著述此书之宗旨加以衡量，凡内容符合并对文史校讎及其学术思想有研究价值者，均选录补入。

三、新编本的编次，内篇以《章氏遗书》本为基础，增以“大梁本”多出之篇。外篇则将原来两种内容合并收入，编为六卷，前三卷为“驳议序跋书说”，后三卷为方志论文。为了照顾长期以来已形成的习惯，每卷排列除少数作调整外基本依旧。此次新增补的各篇，按其内容性质分别编入各有关卷中。

四、凡两种流行版本已经刊行的各篇，包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补遗、补遗续各篇一律不注出处，新增各篇均在篇目下注明出处。

五、原王秉恩、刘承幹所作的校记和注，在每篇中一律注明“王校”、“刘注”字样，为笔者所校勘者只作校记标出①、②……，以示区别。

大梁本《文史通义》原序

先君子幼资甚鲁，赋禀复瘠弱，少从童子塾，日诵百余言，常形亟亟。先大父顾而怜之，从不责以课程。惟性耽坟籍，不甘为章句之学，塾师所授举子业，不甚措意。塾课稍暇，辄取子史等书，日夕披览，孜孜不倦。观书常自具识力，知所去取，意所不惬，辄批抹涂改，疑者随时札记，以俟参考。自游朱竹君先生之门，先生藏书甚富，因得遍览群书，日与名流讨论讲贯，备知学术源流同异，以所闻见证平日之见解，有幼时所见及，至老不可移者。乃知一时创见，或亦有关天授，特少时学力未充，无所取证，不能发挥尽致耳。从此所学益以坚定。著有《文史通义》一书，其中倡言立议，多前人所未发，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易簣时，以全稿付萧山王穀塍先生，乞为校定，时嘉庆辛酉年也。穀塍先生旋游道山。道光丙戌，长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并穀塍先生订定目录一卷，查阅所遗尚多，亦有与先人原编篇次互异者，自应更正以复旧观。先录成副本十六册，其中亥豕鲁鱼，别无定本，无从校正。庚寅辛卯，得交洪洞刘子敬、华亭姚春木二先生，将副本乞为覆勘。今勘定《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

《校雠通义》三卷，先为付梓。尚有杂篇及《湖北通志》检存稿并文集等若干卷，当俟校定再为续刊。

道光壬辰十月，男华绂谨识。